

法称《释量论》藏文译本的蒙古刻本小识

范德康著 杨清凡译

谨以此文纪念 Helmut Krasser!

内容摘要：6-7 世纪印度学者法称所著《释量论》是印度佛教哲学思想史上的丰碑之一，历史上曾被多次译为藏文，最晚的译本是由释迦室利贤（1127-1225 年）、萨迦班智达（1182-1251 年）合作翻译，该译本此前为世人所知的版本均为“近似已编辑的”形式，存于 18 世纪的藏文《大藏经》刻本及同样可判定为 18 世纪的所谓“金汁写本”中。但这部文献的最早刻本应出自 13 世纪末在元大都筹造的雕版。这篇短文对近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出的这一极为珍稀的刻本进行了介绍。

法称（Dharmakīrti, 6-7 世纪）所著《释量论》（Pramāṇavārtika, ཚད་མ་རྣམ་འགྲེལ）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偈颂体文献，我从我的故交——荷兰莱顿大学的斯尔克教授（J. A. Silk）处首次得知其藏文译本的蒙元刻本信息。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他提醒我关注中国的英文新闻网页，该新闻中公布了这项令人激动的发现。尽管网页文字本身有一些问题，但这项发现令人欣喜。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新闻的文字提供的法称该著作标题的英文译名为 *Explanation of Touch-stones*，这个译名非常奇怪；其次，误判该文献的藏文译者是著名的俄译师洛丹协饶（ཚོག་ལོ་ལྷ་བ་སློ་ལྷན་ཤེས་རབ། 1059 ?- 1109 ? 年）。作为物证，网页提供了该木刻本末页（叶 70b）的图片，但不幸的是图片不很清晰，因此读者无法立即从极可能记录有译者信息的文

末书跋中确证这一观点。

该木刻本曾参加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2013年12月3日—12月25日)。我有幸参观了这次展览,得以亲眼目睹该文献,并注意到其译者跋(འགྲུར་བྱང)中清楚地记述道,此文献的梵文原典曾被三次翻译:(1)玛译师格瓦洛追(མ་ལོ་རྒྱ་བ་དགེ་བའི་སློབ་པ། 11世纪后半叶);(2)俄译师(3)释迦室利贤(Śākyaśrībhadra, 1127—1225年)与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合译¹。因此,该蒙古木刻版中的藏文译本应该是后面这个翻译团队的译本。此外,也是这个译本最终被收入4部《丹珠尔》刻本以及所谓金汁写本(迄今可供研究的唯一一部《丹珠尔》写本),这些《丹珠尔》的时间都晚至18世纪。遗憾的是,刻印者跋(པར་བྱང)过于简略,仅仅提到第三任帝师委托雕造了木刻版。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1280年)是元朝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时期的第一任帝师,继之是其同父异母弟仁钦坚赞(1239—1279年)于1274年任第二任帝师。再后,由仁钦坚赞及八思巴之侄达玛帕拉(Dharmapālarakṣita, 1268—1287年)或却迺松瓦/措(ཚོས་སྐྱོད་སྲུང་བ/འཚོ)于1279年继任帝师。达玛帕拉于1279—1287年间担任帝师,因此,这一木刻本的刻版应在此期间,且极有可能是1284—1287年间。

此木刻本共70叶,每面6行。每页纸张正面左右两侧空白处各标有藏、汉文页码。由叶70b判断,每页纸张的背面仅在右侧空白处标有汉文页码。这似乎表明是由汉族工匠负责刻版。另,左侧空白处标有字母“ཀ”,意在说明这是一部目前尚不清楚的木刻本丛书的第一卷。

在刻印者跋里没有说明该木刻本的刻版地点,以及由谁资助。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另一部蒙古版刻本文献——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自疏》(ཚད་མ་རིགས་པའི་གཏིར་རང་གི་འགྲེལ་པ)有所差异,约20年前,我曾有机会对后者进行评述,因为在后面这部木刻本中有详细的印刷者跋²。该印跋记载,刻版的雕造最初由忽必烈的长妻

1 关于《释量论》梵本藏译的初步研究,参见弗兰科(E. Franco):《〈释量论〉的藏译本及梵译藏翻译方法的发展》,卡拉色等编(H. Krasser et al.):《第七届国际藏学研讨会文集:藏学研究》卷1,格拉茨:奥地利科学院,1995:277—288。关于《释量论》在印度次大陆传播状况的综合研究,见克尔纳(B. Kellner):《关于法称〈释量论〉的校勘版》,《维也纳南亚研究学刊》2009—10:161—211。

2 相关书跋参见笔者已刊文《萨迦班智达所著关于佛教逻辑与认识论的两部藏文文献的蒙古版》,《佛教研究国际协会杂志》16,1993:280—283,291—293。及噶瓦·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2009(1):42—43。熊文彬:《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国藏学》,2009(3):91—94。出自这些刻版的一个刻本现存扎嘎尔达索寺(བླག་དཀར་རྩ་སོ),详见སྐ་བ་ཤེས་རབ་བཟང་པོ། བོད་ལུལ་གྱི་ཚོས་སྐྱོད་གྲགས་ཅན་ལག་གི་དཔེ་རྙིང་དཀར་ཆག་པེ་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བ་ཁང་། 2010:41。在后者书中,此文献被称为“汉地刻本”(བྱ་ནག་སྐར་མ)。

察必 (Čabi) 赞助, 工程未尽而察必即已去世。之后, 皇太子真金 (1243/5–1286 年) 正妻阔阔真 (Kököčün, ? –1300 年) 被委任监管雕印事宜。跋中未载木刻版的雕造地点, 但完工时间是“阳木猴年胜月 (pausa, རྒྱལ་ལ) 八日”, 即 1284 年 12 月 16 日³。正如《释量论》的刻本, 这个刻本同样在书侧空白处标有字母“ཀ”。很可能《释量论》的木刻版也是在大都的同一座寺院里完备的。有趣的是, 萨迦班智达著作的另一刻本是在普颜笃汗 (Buyantu Qayan, 即元仁宗, 1312–1320 年在位) 的支持下, 于阴土 [应理解为: 木!] 兔年八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完备的, 即 1315 年 9 月 3 日至 12 月 11 日, 文中含一首偈颂, 第一句是 རྣམ་འགྲེལ་རིགས་གཏོར་སྟོང་ཕྱག་པར་བྲུ་བསྐྱབས། (释量宝藏千版毕)⁴。以前我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句话, 但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推测, 它指的是《释量论》和《量理宝藏论自疏》两部文献的刻本。这两部相关的刻本上的页码与《释量论》的页码不同, 因为这些刻本书页的正面左侧空白处有藏、汉文页码, 而书页背面在右侧空白处仅有汉文页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欢欢博士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给我提供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网址上公布的该木刻本照片资料, 共 4 叶, 即叶 1b–2a, 4a, 5a。据我所知, 该网页已经不再存在。从这张照片可看到, 该刻本在每叶的每一面都有 6 行文字, 雕刻笔法沉稳, 文字清晰易辨。但非常遗憾的是, 这张照片的质量实在欠佳, 以至于那些几乎遍布每一页、用黑色或红色墨汁书写的字体很小的注释都极难辨读。这部《释量论》中的偈颂共 4 叶, 详情如下:

Fols. 1b–2a: རྒྱ་གར་སྐད་བྲུ། ---- ལྷོག་པ་རབ [བྲུ་སྟོན་བྱེད་པ།] PV, I: 1–14b

Fol. 4a: ཉེས་པ་འདི་ནི་ཐལ་མི་འགྱུར། ---- དེ་ནི་ཇི་ལྟར [དེ་ལྟར་ཡིན།], PV, I:

46d–57d

3 这一精确日期及下述两日期的计算, 均系使用舒赫 (D.Schuh) 《藏历历史研究》中所附“表格”推算出。见舒赫《藏历历史研究》“表格”, 《德国的东方写本目录》附编 16, 威斯巴登: 弗朗茨·斯坦纳出版社, 1973。不过, 这些日期可能并非完全准确, 因为它们可能是根据当时使用的汉历记载的。实际上, 我早期文章中提供的日期都计算错了。

4 该刻本可参见 tbc.org W1CZ2047, fol. 190a。当时的帝师似乎应为朵麦巴·仁钦扎 (མདོ་སྐྱོད་པ་རིན་ཆེན་གྲགས), 他继萨迦康萨官的桑结贝 (སངས་བྱུས་དཔལ་ལྷན་ 1267–1314 年) 之后, 在约 1311–1313 年之间任此职。在帝师职位的袭替中明显存在一些问题, 笔者曾撰文对此探讨但未提出结论, 见范德康 (van der Kuijp) 《时轮与元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赞助》, 温图里 (F. Venturi) 编《中央欧亚研究讲座》4, 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2004: 38–39。

Fol. 5a: [སློབ་བྱེད་དེས་བདག] བ་དད་ཀྱང་།---ཕན་ཚུན་ [མིང་ལ་བརྟེན་པ་སྟེ།], PV, I:
69a–80b

将蒙古版中的文本与已知的4部《丹珠尔》刻本及所谓金汁写本中的同名文本相比较，我们发现仅仅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其中两处差异是在当时存在的一些古语被“更新”为现在的标准用语。因此，我们看到在PV, I: *2b中使用的是ཉི་གཉེར་而不是མི་གཉེར་，在PV, I: 6d, 9b中使用སྟོགས་而不是སོགས་，等等。

起初，释迦室利贤和萨迦班智达翻译《释量论》是确凿无疑的。后来有些学者对其随意修订，例如，在14世纪、15世纪，杰出人士像邦译师洛追丹巴（དཔང་ལོ་རྩེ་བ་སློ་གྲོས་བརྟན་པ། 1276–1342年）、色夺班钦释迦却丹（གསེར་མདོག་པཎ་ཆེན་ལྷུ་མཚོག་ལུན། 1428–1507年）曾提议进行数次修订，即使他们的工作毫无用处，对此后的文本注释影响也甚微。在更早些时候，尊巴顿循（བཙུན་པ་སྟོན་གཞོན།）在其1297年作《释量论》注疏中，曾引用过他文中所谓由“我等之上师”（ཁོ་བའི་སློ་མ།）于萨迦寺对藏译文的一些修订⁵。这位学者本人并非梵文专家，曾是萨迦班智达的弟子，此处或许指的是祥多德贝（འཇང་མདོ་ལྷོ་དཔལ།），或者更可能指雄顿译师多杰坚赞（ཤོང་སྟོན་ལོ་རྩེ་བ་དོ་རྗེ་རྒྱལ་མཚན།）、也可能指雄顿译师洛追丹巴（ཤོང་སྟོན་ལོ་རྩེ་བ་སློ་གྲོས་བརྟན་པ།）。后者与萨迦寺关系密切（正如尊巴顿循一样），而且作为一位真正的梵文学者颇享盛名。

附识一：“蒙古刻本”和“汉刻本”两词存在争议，后者用于永乐版（1410年）和万历版（1606年）的《甘珠尔》刻本，并非着重指木刻版所在的地理位置，同样，该词是否有寓意指刻版的赞助者也尚需探讨。这个观点在一部尚未公布的、无标题、无日期的小文献中得以证实，这部文献为觉顿译师仁钦扎西（སྟོགས་སྟོན་ལོ་རྩེ་བ་རིན་ཆེན་བཀྲ་ཤིས། 约1485年–1536年之后）所著，内容是对部分蒙古本藏文文献《五部陀罗尼》（གཞུགས་གྲུ་ལ། [= Pañcarakṣā])与藏文《大藏经》及梵文本相应文献进行阅读和比较。他所用的刻本是由居住在腾格里淖尔（Tengri nor，即纳木错）地区的蒙古人赞助刻版的，因此该刻本被称为 hor par ma（蒙古本）。上述关于“蒙古本”个案的简短研究表明，这个术语晚至16世纪还在为藏族学者沿用。

⁵ བཙུན་པ་སྟོན་གཞོན། ཚད་མ་རྣམ་འགྲེལ་གྱི་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གནས་གསུམ་གསལ་བ་གངས་ཅན་གྱི་རྒྱན། ཟི་ལིང་། གྲུང་གོའི་བོད་གྱི་ཤེས་རིག་དཔེ་སྟེན་ཁང་། 1993 : 343、373、387、416、435。

附识二：笔者在此仍然想表达如下愿望，相信这也是日益增长的从事法称《释量论》研究的国际学界的共同愿望，希望中国的相关机构部门早日将这部珍稀、重要的刻本影印出版！

注：参考文献见原文。

◆ 范德康 男，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座教授

杨清凡 女，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